

辨识哲人的亲缘

——柏拉图《治邦者》开场绎读

张爽

(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柏拉图的《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在《治邦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在《治邦者》开场,苏格拉底鼓励两位年轻人辨识出他们与苏格拉底的亲缘关系,进而走上苏格拉底哲学之路。

关键词:苏格拉底;柏拉图;睿智;数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012-06

一、《治邦者》的戏剧脉络

柏拉图一生都在思考苏格拉底之死的问题。柏拉图似乎暗示,以“知识”为主题的三联剧构成了苏格拉底行动的内在动机。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提出了哲人与知识的关系问题。在《智术师》中,苏格拉底对来自爱利亚地方的异乡人说,那些真正的哲人会幻化成治邦者、智术师和疯子,苏格拉底请他辨明,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究竟是同一种人,还是几种不同的人。这无异于是请异乡人检审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于是在《智术师》和《治邦者》中,异乡人探讨了“智术师”、“治邦者”与哲人苏格拉底的关系。

但是,异乡人却没有探讨“哲人”本身。在古希腊肃剧中,三个肃剧和最后揭示真相的萨图尔剧构成一串完整四联剧,可是柏拉图依据肃剧形式写下的这串对话中,却缺少本应作为萨图尔剧的《哲人》,只因他不打算直接向读者揭示哲人的真相。《治邦者》是苏格拉底走上法庭之前的最后一次私人谈话。《治邦者》的主题是睿智与技艺的关系,与数理哲人迥然不同,作为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中,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并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因而在政治哲人认为,睿智要优于数理。苏格拉底知道,真正的爱智者不可决然割裂实践与理论。睿智处理异质性的城邦问题,苏格拉底借助睿智上升到对整全异质性的思考,并证明整全本身是由异质的存在者构成。通过比照苏格拉底与数理哲人,异乡人表明,数理哲人企图将整全同一化的努力不仅徒劳无益,反而会招致恶果:当数理哲人下降到城邦,强使本该作为政治术助因的数理技艺,成为掌控城邦的主导技艺,这必然会引发政治生活的技术同质化,由此产生的价值中立成为虚无主义的根源,人类丧失了美好生活的可

收稿日期:2011-04-25

作者简介:张爽(1982-),吉林辽源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古典诗学、政治哲学研究。

能。最终,异乡人对苏格拉底的检审结果是:一方面,他赞同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因为与前苏格拉底哲人不同,苏格拉底直面政治,或者说,直面城邦中的纷繁意见所构成的“非存在”问题,由此开启了哲学的“第二次启航”(《斐多》99c);另一方面,异乡人也批评了苏格拉底哲学活动,因为苏格拉底以睿智上升到超出城邦,脱离了政治生活这一他原初的哲学起点,遮蔽了睿智的政治含义,他强烈的哲学爱欲忽视了礼法,招来城邦民的怨恨。异乡人向苏格拉底建议:要么遵照雅典的法律赴死,从而揭示政治哲人与城邦的张力;要么从今往后,苏格拉底不仅要作哲学的诗歌,还要为众人作诗,也就是为已经失去传统宗法根基的希腊重制礼乐。

从《治邦者》出发,柏拉图为我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两条道路:《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斐多》构成了苏格拉底为哲学而赴死之路;在《法义》中,苏格拉底乔装打扮逃到了克里特,这构成了苏格拉底的重制礼乐之路——这一逃脱只能出现在柏拉图对话中,因为苏格拉底在《克力同》中暗示,倘若他还年轻,也许会为了爱智而逃离雅典的处罚(《克力同》43c;对勘53d),而柏拉图对话描绘的是“变得青春美貌的苏格拉底”(《书简二》314c)。在《法义》之前,西方的立法活动只有凭机运而没有凭睿智的立法学问(《法义》709a-b),但尽管如此,仍不能忽视柏拉图暗中对读者的提醒:哲人的立法活动并非是哲人最高的哲学活动。这一提醒引领我们回到《治邦者》。异乡人暗示,正如礼乐作为睿哲的作品,无法全然代替睿哲,因为礼乐难免单一化,无法完全处理异质变化的人世生活。同样,柏拉图对话是柏拉图的“礼乐”,这一作品也不过如图画一般,勾勒出苏格拉底的言行形式,却无法复活真正的苏格拉底。可是,既然苏格拉底无法向我们说话,那么礼乐对城邦生活而言不可或缺,正如柏拉图对话对研习哲学而言不可或缺。看来,柏拉图刚否定了自己的对话作品,就马上否定了这一否定。柏拉图对话中构成的哲人之诗,邀请读者思考“什么是哲人”这一问题,读者将一幅幅对话中的图画拼合起来,研究其中抽离掉的东西,并自行在心中重现柏拉图思想的完整织体。这很像哲人在洞穴中用眼睛观看扭曲、片面的影像,而用心智去结合并反思出真实完整的存在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治邦者》部分揭示了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方式。由此,就像异乡人称礼法是“第二次启航”一样(300c1-2),哲人重制礼乐既是为了民众过上美好生活,也是为了保存哲学的可能,柏拉图对话模仿并实现了苏格拉底哲学

的“第二次启航”。

二、数学家的错误(257a-257c3)

《智术师》始于一大清早,当对话结束时,大概已是正午。那么《治邦者》可能就发生在正午到黄昏的这段时间。对话的主要人物是爱利亚异乡人与昔兰尼人忒奥多洛斯,忒奥多洛斯的弟子小苏格拉底、泰阿泰德和其他未发言的学生,还有苏格拉底。忒奥多洛斯因教授几何而闻名雅典(色诺芬,《苏格拉底往事录》,IV,2,10)。与《智术师》一样,《治邦者》的场景也在雅典运动场。对话伊始,苏格拉底说道,自己欠忒奥多洛斯很多人情,由于忒奥多洛斯的关系,苏格拉底才结识了泰阿泰德和异乡人。苏格拉底依次提到泰阿泰德和异乡人,这让我们回想起《泰阿泰德》与《智术师》的情节,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中认识了泰阿泰德,发现了泰阿泰德的灵魂之美,并从他那里知道了小苏格拉底。第二天,他又认识了异乡人,而且,为了答复苏格拉底的问题,泰阿泰德与异乡人刚刚一起“捕获”了智术师,这发生在《智术师》中。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进一步认识了泰阿泰德的品性,以及异乡人不同于传统爱利亚派的哲思。可见,苏格拉底出于好多原因感谢忒奥多洛斯。但忒奥多洛斯却想当然地以为,苏格拉底真正要感谢的,并非他认识异乡人与泰阿泰德这两个人,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是这二人一起给苏格拉底带来的好处——即他们为苏格拉底回答了何谓智术师。忒奥多洛斯过快的联想,一则因为,他认为《泰阿泰德》是场失败的对话,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二则因为,作为一个数学家,他对人本身不感兴趣,这一点恰与苏格拉底相反。苏格拉底最爱去市场与人闲谈,因为对苏格拉底而言,认识各种各样的灵魂是一大乐事。在苏格拉底看来,泰阿泰德与异乡人探询智术师的过程,不见得比这二人本身的灵魂品质精彩。在《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请异乡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忒奥多洛斯接着就说,异乡人记得爱利亚圈内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这里只是复述而已。异乡人也说,为了复述方便,要找个听话的伙伴回答着讲,否则不如自己讲。随后,异乡人选择与泰阿泰德对谈,这意味着,异乡人之所以选择泰阿泰德,只是因为他很听话(《智术师》217-218a)。

可是,真正开始问答以后,异乡人并非复述,而是根据泰阿泰德的天性与之对谈。于是,《智术师》这场由异乡人主导的对话,目的之一是教育泰阿泰德。其中,异乡人不顾帕墨尼德的教诲,试着探究非存在,好让泰阿泰德敢于面对智术师造出的纷乱幻象,从而使节制的泰阿泰德变得勇敢起来——这不啻于苏格拉底在《泰阿泰德》中检审了泰阿泰德之后,异乡人又再次对泰阿泰德进行了检审,尽管二人的检审形式不同,但目的却都在探查泰阿泰德的灵

魂品性。

苏格拉底在开场首句中为结识异乡人而感谢忒奥多洛斯,部分是因为异乡人在《智术师》中的论证,因为异乡人揭示了作为哲人幻象的智术师,亦即揭示了哲人的伪装之一。可是,哲人的伪装并非哲人本身,倘若异乡人真的揭示了哲人,那么苏格拉底自会大大感谢异乡人,而非忒奥多洛斯这个中介人。忒奥多洛斯不这么认为:“苏格拉底,等他们给你造好了治邦者和哲人,你就要欠下我三倍的情喽。”这句话最奇怪之处在于,忒奥多洛斯掂量了三种人的分量,列出了他们与“人情”的比例,这位数学家竟然精准到以数学衡量人事,要知道,忒奥多洛斯从不开玩笑(《泰阿泰德》145c)。忒奥多洛斯不直面超自然与人事的复杂状况,而直接以数学工具改造现实。依据泰阿泰德的老师普罗塔戈拉,在雅典民主制下,应用技术保证了自由民都同样具有美德(《普罗塔戈拉》320c-324a),那么,由此可以推论,有资格做美德教师的人也就是最懂得理论科学的人。技术可以改造自然,进而使人的品质差异变得多余,这诱使数理哲人以为,理论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政治知识,同质性的理论技艺完全可以取代异质性的政治术。果真如此么?

苏格拉底反问道,我们听到的是算数、几何高手的话吗?听起来,忒奥多洛斯犯了一个数学上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搞数学的行家里手,才易犯这种错误。忒奥多洛斯不明白苏格拉底的用意,苏格拉底解释道:“你置这几种人于同等价值,可这三者在荣誉上相差悬殊,凭你技艺中的比例可解决不了。”忒奥多洛斯这位数学家希望以自己精通的事物理解一切,可是,数学家无法以尺和圆规测量人的灵魂,因而也搞不清智术师、治邦者、哲人在荣誉和价值上孰轻孰重,这是数学家凭数学比例解决不了的问题。忒奥多洛斯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在《泰阿泰德》中,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发现泰阿泰德的灵魂之美。也是在那时,他觉得苏格拉底是个智术师,继而认为应该有个赫拉克利特般的哲人来制服苏格拉底。忒奥多洛斯虽然承认哲人高于智术师,但是辨识不出苏格拉底的真实身份,反把他当成智术师。由此可见,忒奥多洛斯完全不知晓智术师和哲人,以及这二者的差别。作为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忒奥多洛斯自认为是站在理论科学的顶峰向下俯瞰,他想当然地以为理论科学高于一切。在他看来,正如《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所述的“顶尖哲人”高高在上一样,同质性的技艺也是研究一切的最高原则。因而,即使他本人已放弃了对超自然领域的数理研究,但是他相信存在这样的“顶尖哲人”。

在《智术师》开场,忒奥多洛斯声言,他找到了“有分寸”的神圣哲人——来自爱利亚的异乡人。正

如他曾认可高高在上的数理哲人可以洞察人事一样,他相信异乡人和他心爱的弟子泰阿泰德会“造出”治邦者和哲人——智术师、治邦者与爱伪装的苏格拉底式哲人成了顶尖哲人的造物。在以数学为唯一尺度的条件下,忒奥多洛斯认为这三种人的价值相同。忒奥多洛斯与苏格拉底的冲突,是有关纯理论与人事问题的冲突。为了反驳忒奥多洛斯,苏格拉底挑明了政治与数学,或睿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因为,只有政治智慧或睿智才能辨明“高贵”或“美”,继而认清依据自然的高贵而安排的高低秩序,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价值”、“荣誉”。与数学和其他技艺的价值中立相比,政治技艺必须关注意义和目的。苏格拉底用一句话就使忒奥多洛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应该归功于雅典律法的效力。他提醒忒奥多洛斯:尽管当时的雅典礼法已经残破不堪,然而,启蒙知识人向往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民主制仍旧不可能实现,因为雅典城邦中尚有老人与维护传统诗教宗法的政治人及诗人,他们不允许新兴知识人颠覆传统的秩序。祖先与后辈或父子的高低位置说明,一种彻底的技术民主制是违背自然的。忒奥多洛斯当然知道阿那克萨戈拉和普罗塔戈拉被逐出雅典的事情,因而在三联剧的前两部开场,他显得谨小慎微。但是,在《智术师》中,异乡人的划分法声称,为了获取心智,要置所有技艺于同等荣誉,而将抓虱子的与将军同列(《智术师》227b8)。仿佛心智只是同质性的(对勘《智术师》249b)。爱利亚异乡人划分法中表现的数理同质性使忒奥多洛斯得意忘形,直到苏格拉底提醒他,忒奥多洛斯才想起,他们正身处于雅典城内的公共运动场。与此同时,苏格拉底也就点明了划分法在分析政治事物时的本质缺陷,他暗中建议异乡人摘下他数理哲人的面具。

通过比较“智术师”、“治邦者”、“哲人”的价值和荣誉,苏格拉底引入了三种人的自然差异问题。在《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哲人”常幻化作“智术师”或“治邦者”,这似乎在暗示,与哲人相比,“智术师”和“治邦者”不过是不真实的影像而已。《智术师》中的异乡人在论述苏格拉底的智术师伪装时,称这种伪装为“出身高贵的智术师”(《智术师》226b-231c)。可见,异乡人不得不顾及价值和荣誉。在《智术师》235c处,异乡人暂且不用划分法,转而向泰阿泰德阐明他们探询的目的:他们抓捕智术师这头“野兽”,是遵“王者的逻各斯(βασιλικου λόγου ζ ,或意译为“王道”)-之命。在对话结尾,异乡人与泰阿泰德阐明,智术师(σοφιστής)不过是窃“智慧者”(σοφός)之名的无知之辈(268b-d),那么如今,通过向忒奥多洛斯暗示政治的威严,苏格拉底意在提醒他,别忘了刚刚的谈话中,忒奥多洛斯眼中的“神圣哲人”已经承认了智术师与治

邦者(或王者)、哲人之间的高低关系。“出身高贵的智术师”辩驳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以祛除灵魂的无知,达到教导的目的,这正是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形象。另外,苏格拉底也是善于制造影像的魔术师(《智术师》232b以下)——这使苏格拉底看起来像“智术师”;“王者的逻各斯”一词,则很好地表达了苏格拉底与王者的共同之处:与理工科知识只是关注和解决局部知识不同,治邦者与苏格拉底一样,关注并追求人的完善,关注好的生活。治邦者关注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追求公共福祉。城邦共同体由邦民的集合组成,城邦民高低有别、性情也多种多样,治邦者的任务在于如何结合这些异质因素,为本着不同目的而生活的城邦民建立高低秩序,因而,治邦者的目的是综合性的,勾连高低的,治邦者不能只考虑局部,必须顾全大局,否则城邦就是一盘散沙。所以,治邦者命令手艺人和技术专家而非相反。尽管我们知道了治邦者与智术师的高低之别,却尚不知晓哲人与这两种人的区别何在。

忒奥多洛斯夸苏格拉底讲得好,他以阿蒙神起誓,说苏格拉底讲得在理。“在理”或“正义”、“正直的”一词,在传统上与城邦相关,多指人遵从礼法或统治(对勘,希罗多德,《原史》2,177)。忒奥多洛斯用该词向苏格拉底表明,自己很清楚当下的政治处境,可是既然忒奥多洛斯是昔兰尼人,他应当遵奉的是昔兰尼的神。因而,忒奥多洛斯提到“我们的神阿蒙”,借此委婉地挑明了雅典与昔兰尼不同礼法之间的冲突。忒奥多洛斯暗示,既然不同城邦的礼法之间有冲突,那么城邦所遵奉的价值也是相对的。忒奥多洛斯暗示,苏格拉底讲得“在理”或“正义”不过是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而已。雅典的法具有现实约束忒奥多洛斯的效果,可是,这位数学家不认可城邦的礼法在理论上也是至高无上的。

在希罗多德《原史》II,42处提到,埃及人称宙斯为阿蒙,据忒拜人流传,赫拉克勒斯想要见宙斯,宙斯不愿意赫拉克勒斯看见自己的真相,于是他披上公羊皮,挂上公羊头,只让赫拉克勒斯看见伪装之后的自己。这使人想起《智术师》中,苏格拉底称异乡人也许是个神时所引用的荷马诗句,诗句中提及的正是伪装之下的宙斯,这位正义之神下界惩罚违背礼法的狂徒。当时,忒奥多洛斯立即反驳了苏格拉底,称异乡人是哲人。接着苏格拉底说,哲人也不好辨认,因为哲人与神一样爱伪装。忒奥多洛斯不懂苏格拉底的意思。忒奥多洛斯,这个从不开玩笑的数学家,因为厌恶哲学的玄奥复杂而离开了普罗塔戈拉,又极力反对那些主张万物皆流的赫拉克利特派哲学,他选择了具有确定性和明晰性的数学,他完

全不理解爱隐匿自身的哲人,也不会认可赫拉克利特的箴言:自然爱隐匿自身。这样看来,此处忒奥多洛斯提及阿蒙神,决非意味着他追随苏格拉底,承认神爱伪装,而是相反,他通过列举自己地方信仰的大神,不过是表明自己地方的习俗,这虽不同于雅典的习俗,却仍是习俗。由此必然推导出,以神法为支撑的正义也不过是一种习俗,而非自然。苏格拉底在《王制》卷二阐述了一种神学,他证明,神决不会变化,不会撒谎,神永远处于自己单一形式的尽善尽美中,神出于正义的惩罚只会使人变好,而不会使人悲惨。看来,《王制》中的神学是为这种不能再信仰自己祖宗神的知识人而准备的。

苏格拉底警告忒奥多洛斯,不能用数学比例估价智术师、治邦者、哲人,但忒奥多洛斯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只承认自己的计算有误,忒奥多洛斯夸苏格拉底的记性好,是暗示苏格拉底之所以能指出这一错误,也不过是因为苏格拉底记得爱利亚异乡人的谈话中,治邦者或王者高于智术师,就像忒奥多洛斯以为,异乡人能够界定三种人,是因为他记得爱利亚派的说法(《智术师》217b8),忒奥多洛斯仿佛对异乡人修改帕墨尼德箴言的话置若罔闻,仍坚持认为异乡人是在复述爱利亚派的论说,好像爱利亚派的论说就像数学公式一样,不当有任何变化。忒奥多洛斯向苏格拉底暗示了城邦礼法的相对价值以后,还没有证明数学的绝对价值,以及该如何用数学计算三种人的比例关系,于是,他对苏格拉底说:“以后再找你算账。”看来,忒奥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的申辩有信心,他不至于想在苏格拉底被判刑监禁后,到雅典监狱中找苏格拉底报仇,忒奥多洛斯并没有出现在《斐多》中。忒奥多洛斯对苏格拉底申辩成功的信心,源于他对雅典宗法乃至任何城邦宗法的蔑视。

接着,忒奥多洛斯转向异乡人,叫异乡人莫倦于向他们施惠。也许,在亲自找苏格拉底算账之前,忒奥多洛斯期待异乡人先为他报仇?异乡人在探询治邦术时的纯数理倾向,的确可以看作异乡人为忒奥多洛斯报仇^①。可是异乡人后来让忒奥多洛斯及其弟子看到,迫于事实,这种报仇并不适当,异乡人运用划分法的一系列溃败表明:数理局限于同一,无法处理城邦的异质事务。即便如此,以忒奥多洛斯拒不承认数学局限的性情看,这位数学家很难因此而回心转意,因而在对话中,忒奥多洛斯始终是个旁观者,他的学生才是受教者。忒奥多洛斯接着对异乡人说,下面是先将治邦的男儿,还是哲人,“任你选,选好了就谈吧”,忒奥多洛斯连说了两次“选择”(προαίρεω),可见柏拉图笔法,塑造人物性情之精

^①参见 Benardete,《情节的论辩》(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 Chicago, 312页。

妙,宜深玩味。按照《智术师》开场苏格拉底的暗示,不先探究哲人的伪装(智术师、治邦者),就没法探究哲人。但忒奥多洛斯仍旧故我,全然不顾治邦者、哲人的价值区别,好像先讲治邦者,还是讲善于伪装的哲人,真有得挑一样。

三、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257c4 - 258a)

异乡人应承忒奥多洛斯,他说道是该这么办,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就要达到目的才结束。异乡人的教诲始于《智术师》,止于《治邦者》,异乡人莫非是说,揭示了苏格拉底式哲人的两种幻象,就已经揭示了苏格拉底式哲人?倘若如此,苏格拉底这个哲人就是智术师与治邦者本性的综合,智术师善于变异和造像,治邦者则分辨、调和异质因素,要是我们知晓哲人如何综合这两种性质,就能够知晓为何苏格拉底要致力于政治-道德问题。

接着,异乡人征求忒奥多洛斯的意见,要求变更交谈者,让泰阿泰德下去休息,换与苏格拉底同名的青年上来。在异乡人的请求之前,忒奥多洛斯完全认为泰阿泰德胜任治邦者的讨论。从《泰阿泰德》中,我们了解到,泰阿泰德是个节制的年轻人,他是雅典人,并且听说过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的问题感到好奇,却没有勇气主动与苏格拉底谈话,反倒是他的老师忒奥多洛斯将他引介给苏格拉底。当苏格拉底问他:人通过什么而知觉“在”、“不在”等共性时,泰阿泰德以宙斯起誓,自己指不出,但他的意见是,灵魂不借助其他手段,而是通过自身检验一切事物的共通之处。苏格拉底由此发现了泰阿泰德的美。苏格拉底声称,言谈美妙的人既美且善,因为泰阿泰德使他不必多费口舌来论证这一点(《泰阿泰德》185c3 - e)。

在《智术师》中,爱利亚异乡人希望鼓舞泰阿泰德勇气,他将他们二人探寻智术师的过程比作狩猎野兽。异乡人在区分制作术时,区分了神的制作与人的制作,泰阿泰德表示难以明白这种划分,随后他承认,也许由于自己还年轻,他时常在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究竟是神造就了世间万物,还是像众人以为的那样,一切是自然自发形成的。可是此刻,泰阿泰德看着异乡人,猜想异乡人认为万物当归于神功,于是他也愿意这样想。异乡人马上夸泰阿泰德说得美,并称自己了解泰阿泰德的天性,纵然不必言辞,泰阿泰德也会对神造万物坚定不移,因而不必大费周章地说服他(《智术师》265b5 - e3)。这样,我们对泰阿泰德的天性已有所了解:他适度、节制,懂得凡是莫过度追问,且常常怀有美的意见,不必理性推论,他相信灵魂和神的存在以及神造万物。泰阿泰德之所以能处理无理数问题,恰恰因为他不是对无理数寻求一个终极的解决,而只是归纳无理数的现象。泰阿泰德最终为了履行邦民的义务而战死沙

场,欧几里得称泰阿泰德既美且善(《泰阿泰德》142a6 - b)。终其一生,泰阿泰德是一位相信美好事物,不越礼法,具有君子风范的数学家。

《智术师》开头,异乡人因为以前和泰阿泰德谈过,而选择与泰阿泰德对答,泰阿泰德说道,他想此时还不至于疲倦,可一旦他支持不住了,他推荐他的同伴小苏格拉底代替他,因为他们常常一起做事(《智术师》,218a - b4)。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找不如自己的人代替自己工作,而是找与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共事。表面上,苏格拉底提出的论题有三个:智术师、治邦者、哲人,泰阿泰德说由小苏格拉底代替他,却没提他们轮流上,他似乎要把剩下的议题都交给小苏格拉底。我们猜想,泰阿泰德比小苏格拉底更知道适可而止,小苏格拉底则比泰阿泰德更有耐力。他们平常共事可能也是这般搭档。小苏格拉底必定有冒险的勇气,这样才能与泰阿泰德一起探求无理数。而我们知道,忒奥多洛斯认为泰阿泰德是他最好的弟子,夸泰阿泰德异常温顺,又最具男子气。其他机敏相若者,是男子气过劲了,毋宁说是狂躁(《泰阿泰德》144a - b)。可是,异乡人并不认为,一个非哲人能轻易具备节制与勇敢两种德性,他暗示,忒奥多洛斯误以为狂躁的小苏格拉底,才是男子气概的人。《治邦者》需要一位有男子气的人参与讨论,因为探讨的内容可能会损害泰阿泰德的温和天性。在《智术师》中,异乡人刚好利用这位从神明处求得的泰阿泰德(θεαίτητος),利用泰阿泰德的敬畏之心来早早结束“智术师”的讨论——实际上,异乡人运用了智术的花招,骗过泰阿泰德,用造像术造出一个创世神,即一个虚假但美好的幻象,以便早早结束对智术师的追捕。然而,在《治邦者》中,他不得不运用无神论神话,以揭示礼法真空的世界中真实而丑陋的东西,异乡人还必须向谈话人展示政治的严酷性,异乡人认为,勇敢的小苏格拉底是不二人选,果然,异乡人说起净化城邦时需要杀人与放逐,小苏格拉底听了并不为之动容(293d - e)。小苏格拉底不懂得节制,爱刨根问底。他也不畏艰难,当异乡人让他选择走漫长的路还是捷径时,小苏格拉底竟然选择两条道都走(265a)。于是,爱利亚异乡人抑制小苏格拉底的男子气概,以训练他懂得节制(262a)。

可见,在《智术师》、《治邦者》两部对话的情节中,异乡人有意中和两位年轻人的天性,使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不仅在知识上相合,而且使彼此能够倾听到对方的灵魂特性^[1]。在忒奥多洛斯同意小苏格拉底代替泰阿泰德时,苏格拉底道出了自己与两位青年的联系:泰阿泰德与他外貌相似,小苏格拉底与他同名。如此看来,苏格拉底不仅希望两位年轻人在表面上与他相似,也希望他们的内在性情成长得与他相当,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希望泰阿泰德与小

苏格拉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人(《泰阿泰德》142a-143c)。而作为潜在的哲人,这两位青年也有着面临审判的危险。这段话是老苏格拉底在《治邦者》中最长的发言,也是最后的发言。此后,他便默默听异乡人与小苏格拉底对答。鉴于老苏格拉底即将走向法庭,因而,辨识小苏格拉底是否是政治哲人具有反讽意味,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意思是,泰阿泰德与小苏格拉底应当辨识出苏格拉底,从而走向苏格拉底哲学。毕竟,泰阿泰德节制,小苏格拉底勇敢,他们是两类人,二人与苏格拉底某个单方面的相似,不能保证他们能够补全自己天性上不具备的要素。《治邦者》结尾,异乡人表明,只有哲学才能够融合节制与勇敢,进而统一德性。

对于开场时忒奥多洛斯与苏格拉底的争执,异乡人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同苏格拉底一样,深知智术师、治邦者、哲人三者的差别,因此认可苏格拉底一开始说的考察顺序:“我认为,智术师之后,我们两个

人无疑应该去找一找治邦者。”(258b)但异乡人却决定以数学的方式开始,这看起来违背了苏格拉底之前说的“不可以用数学度量三种人的价值”,可是,我们只要想到,在对话的中心,异乡人把度量技艺分为数学的度量与中道的度量,以此确定中道的主导地位与数学的附属地位,我们就会明白,异乡人不得不采用这种教育方式,以便使小苏格拉底认识到数学的局限(对勘284e)。

《治邦者》开场是整部对话最具有戏剧因素的部分,接下来,异乡人与小苏格拉底将走向严肃的划分法之路。《治邦者》始于数学家的错误,这提醒我们,留意划分法中包含的反讽和谐剧因素。

参考文献:

- [1]施特劳斯.论僭政[M].何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21.

The Opening of *Statesman*: Recognizing the Kinship of the Philosopher

ZHAHG Shu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P. R. China)

Abstract: The *Statesman* is a key to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Socrates devoted to the inquiry into human affairs or political issues.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rates and statesman(or king). In the *Statesman*, the Eleatic Stranger shows that Socrates stands apart from mathematical philosopher. As a political philosopher, Socrates went down into the cave of the city and observed all sorts of the opinions which look like images, thus he grasped phronêsis or practical wisdom. Phronêsis means that one should do in the middle ground so as to arrive at the end of politics or philosophy—the best society, or the best man.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 accounts that phronêsis is superior to mathematics. In the opening of *Statesman*, Socrates encourages two young men to recognize the kinship between them and Socrates, and then the young men will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Socratic philosophy.

Key words: Socrates; Plato; phronêsis; mathematics

(责任编辑 胡志平)